

YULUNXUE JINGYAO

舆论学

精要

李衍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J12WL01

舆论学精要

李衍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舆论学精要 / 李衍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442 - 1

I. ①舆… II. ①李… III. ①舆论—研究 IV. ①C912.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38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徐楠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252 千字
定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舆论学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难以把握其运行规律的一门学科。因为这门科学所反映的对象是一种复杂的公共意识，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被虚拟化了的意识。这种意识完全地被社会化，而且经常演变为某种群体的意志或局部的意志。这种意识的纷杂失序和丰富的两面性都对涉足此领域的研究者提出了挑战。本书本着普及、研究和建言三重目的对舆论学的基本理论和现象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析，虽然名曰“精要”，但不敢言“精”，还望各位同人、读者赐教、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舆论是什么	(1)
一	舆论的实质	(1)
二	关于舆论的思想和理论	(6)
第二章	舆论的两面性	(17)
一	舆论的正确与错误	(17)
二	舆论的自恃与脆弱	(29)
三	舆论的显性与潜性	(35)
四	舆论的价值性与科学性	(36)
第三章	舆论的有效与价值	(40)
一	舆论的有效性	(40)
二	舆论的价值	(46)
第四章	舆论的形成	(48)
一	舆论的起因	(48)
二	舆论的整合与形成	(50)
第五章	舆论的种类	(56)
一	领域性分类	(56)
二	主体性分类	(65)
三	表现性分类	(69)
第六章	舆论的社会功能	(70)
一	信息交流功能	(70)
二	科学与价值判断功能	(71)
三	社会调节功能	(72)
四	鼓舞与激励功能	(74)
第七章	促成舆论的手段与时机	(78)

2 舆论学精要

一	促成舆论的手段	(79)
二	促成舆论的时机	(103)
第八章	现代舆论的特点	(107)
一	舆论的空前繁荣	(107)
二	舆论引发主体的普遍性	(107)
三	舆论的生命周期变短	(108)
四	社会舆论整合的难度加大,反复性加强	(108)
五	上下层舆论的脱节性	(109)
六	监督性舆论与科技舆论要求明显增长	(110)
七	新闻媒体引导舆论成为常态和重要工具	(110)
八	舆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	(113)
第九章	民意测验	(114)
一	民意测验的历史	(114)
二	民意测验的步骤与方式	(116)
三	民意测验的控制与矫正	(118)
第十章	现代舆论战解析	(124)
一	舆论战资源	(131)
二	舆论战手法与技巧	(132)
三	对国际舆论战的应对	(147)
四	舆论战带来的伤害和损失的补救	(159)
	结语	(161)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163)
附录二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165)
附录三	《论出版自由》(节选)	(167)
附录四	《革命军》(节选)	(172)
附录五	《敬告青年》	(178)
附录六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180)
附录七	《少年中国说》	(185)
附录八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演讲	(190)
附录九	希特勒在1939年4月28日对罗斯福答复的演讲片段	(193)
附录十	《论持久战》(节选)	(194)

附录十一 丘吉尔在二战时期的一次广播演讲	(210)
附录十二 1895 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内容（节选）	(213)
主要参考文献	(227)

第一章 舆论是什么

2009年12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刻分析了2009年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预测了2010年我国社会发展趋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正式对外发布《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2009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6%，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微博客崛起，网络议题更加广泛。有线载体（互联网）和无线终端结合，人们很容易通过这些终端进行更为便捷的信息传播。微博客表现得也十分活跃，一些“意见领袖”对网民的感召力和煽动性极强。“互联网蓝皮书”根据对五大门户网站热点事件跟帖数量的统计，指出，跟帖过万的热点事件有5项，分别是：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重庆打黑风暴、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网瘾标准与治疗。这些热点主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网络传播出现了新的变化，不但需要我们加强网络传播的舆论引导和管理，也需要我们对舆论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梳理，时刻把握舆论运动的规律，为人类和社会的长足发展服务。

一 舆论的实质

研究舆论要以舆论的产生为前提。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舆论渐渐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共同劳动需要信息的交流和意见的协调，舆论

2 舆论学精要

也就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了。可见舆论有其目的性。通常上讲，舆论是指公众的意见，是社会上许多人的共同或可达到一致的意见。我国研究舆论学的专家刘建明先生曾经这样解释过舆论，“舆论是人们对于社会生活及其相关领域现象、现实、本质等方面意见的公开表达，是一种共同意见或多种意见的集合体”。这是具有理论建设意义的。但在具体实践上，舆论的确立不仅包括那些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也包括合理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在许多情况下，舆论应当是社会上许多人认可的意见。这其中的“许多人”是指合理多数人。所谓“合理多数人”，要随舆论的性质、舆论形成的社会条件而定，并不存在特定的数量。只要这些“合理多数人”所认可的意见足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就达到目的了。因为舆论确立的关键是被社会所关注，与舆论主体数量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舆论的主体，其数量往往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一个人在引发舆论，如精英舆论。像这样的舆论也可以被社会广泛认可，进而形成真正的社会舆论。所以说，舆论应当是被合理多数人认可的意见。在现代社会，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决定了舆论引发主体的多样性，使舆论形成的过程复杂化，也使舆论意见的整合成为常态，像因战争那样群体意见的迅速而且是真正的统一现象并不多见了。而这其中的原因就是：舆论已不仅是简单的信息和意见的交流、传播，更重要的是，舆论已经成为意志碰撞、交锋的场所。舆论的实质就是介于思想与意志之间的载体。就是说，舆论是联系意愿与意志的桥梁。它是社会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凝结，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意志形态。在思想、意见到达意志的征途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能全知和确知，但我们可以确知的是其发生原因和产生结果会各有不同。这就是舆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

可能连小孩子都不会否认，武力与暴力是压制人们意见的最原始、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工具。战争和国家机器既可以达到人们意志的统一，也可以达到打击或抑制人们意志的目的，尽管这两者都不能滥用。如美国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为了控制一些国家的重要能源，不惜诉诸武力使这些国家屈服。自“二战”以来，原先这个吝惜武力的国家，先后发动了多次对外战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好战国。在历次战争中，他们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对方的大众媒体。同时，还通过武力打击扰乱目标国家及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以期“乱中取利”。暴力与武力的镇压也很容易使当地的舆论沉默下去。例如，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

被称为“十年浩劫”，这当中既有政治和文化方面对于人权的侵害，更有“打、砸、抢、烧”等暴力性强制事件的大量发生。1975年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骇人听闻的“张志新事件”就是专制势力打击捍卫民主、真理行为的丑闻和暴行。那年，张志新被人强行割断了喉管，最后含冤而逝。当时辽宁省委的一些领导从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还是不能挽回张志新同志年轻的生命。有一位领导同志也坦言：张志新烈士之死归咎于缺乏民主法制的专制制度。张志新冤案绝非孤例，如果不健全民主法制，类似的悲剧还将发生。事实上，在那个动乱年代，一些当权者一旦认为党内外不同意见是一种“威胁”，就会想方设法地控制和扼杀这些不同意见，更不会允许不同意见之间平等地加以讨论，而只会将有不同意见的对手轻则软禁，重则判刑乃至让其彻底消亡。武力和暴力压制人们的意见在今天已经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所不齿，但这种行为也很难禁绝。尽管利用武力和暴力控制言论是控制舆论的最迅速有效的方式，但它对民主和秩序的破坏力是很大的，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进行宣传 and 引导就可能是整合分散意志和强加意志的最好方式了。因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好地避免或减轻各方的冲突，使各方意志都不敢轻易伸张，有点“软刀子处理”的意味。当然，战争和暴力也可能成为整合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力以及统一国家意志的导火索和工具，如“普法战争”和美国的“南北战争”等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利益是调整社会各种关系、维护和引导社会秩序的现实基础，真正的舆论体现着社会关系状况，尤其是社会中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基本状况。在关系利害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正确的舆论意见往往会选择沉默，让其消弭，而只对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意见明确表态，大力推扬，以满足私欲，而不顾其真伪、善恶与否。利害关系就成为压制舆论、扭曲舆论的一个罪恶源。政治权威也关系到人们的利益，可能造成舆论的失言、哑火。“智力真空”是影响舆论的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方面，这种现象常常发生在科技舆论表达中。例如在二战中，英国利用发明的雷达探测到了德军飞机的飞行，当时德军并不知情，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德军参谋本部都纷纷议论之，许多人怀疑是不是德军内部出了叛徒、间谍，出卖了德国空军有关情报，但严格而又全面的调查却无果而终。后来在英国又出现了德军飞机屡屡得手的情况，英国方面舆论大哗，也怀疑是不是英军方面出了内奸。然而事实证明，德军和英军内部都无叛徒。在德军吃亏的时候，是因为德军

4 舆论学精要

不知道英国已发明了雷达。而在英军失利的时候，是由于那天太阳活动剧烈对英国雷达产生了严重干扰。“智慧真空”、“智力真空”现象对舆论形成的危害并不仅限于军事领域。现代社会人们对信息、科学的需求与日俱增，科技舆论、精英舆论体现着人们的精神诉求，是人们不能割舍的。但同时与科技舆论、精英舆论形成过程中相伴随的“信息真空”现象却难以根除，甚至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产生直接的、重大的影响。美国总统里根在任时所发起的一项重大的争夺外层空间的战略计划，几乎左右了国际舆论。该计划经过美国新闻媒体的大肆宣传，甚至拍成了专门的电影、电视，一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据当时的报道，观看过影片的许多美国家庭认为电影确实具有身临其境的效果，以至于不少人晚上观看时因极度恐慌而争先恐后地逃出室外，引为笑谈。但该计划和媒体宣传引起的这场恐慌和新奇并没有被遏止，还流出了国界，流向了世界。尤其是苏联对此心存不安，为了保持实力上的均势，苏联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展开与美国的竞争，但最终美国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一计划。事后有不少学者分析认为，美国的这一计划是利用媒体施放的一枚“烟幕弹”，其用意之一是吸引苏联的注意力，让其跟随美国投入大量资财，从而在经济上削弱、拖垮苏联。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苏联付出的代价和遭受的损失可就太大了。“智慧真空”现象在舆论表达中也是很常见的，如对于“全球化利弊问题”的理解就是一个迄今尚未理清的问题。再如，对于国家民主性程度的考量问题，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传统观点认为“民主性”的最高数量指标要属于美国、英国和法国。但测量民主性的标准是多元的，有时带有意识形态的东西，研究者观察和测量的角度也有所不同，并且人们用以测量、评估民主性的标准还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因此，民主性的测量往往是一个短期性的、相对性的概念和指标，而难以成为长远的、全覆盖性的标尺。在需要协调、平衡利益的时候，舆论又像是一个腼腆、羞怯的小姑娘那样，循规蹈矩，不事张扬。因为那时所谓的公众舆论，已经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彼此妥协了的意见。利益诱导和输送也是引导和调整舆论的利器。如中国清代统治者看到知识分子是引导社会舆论的中坚力量，为维护其统治，也特别注意笼络这些人，惠之以科举取士、功名利禄。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单纯舆论的生存有多么的艰难。舆论虽然可以成为默认的公共法则，但却难以成为公认的行为准则。一个正常

的、单纯的舆论应当是这样的：其表达是自愿的、多元的。但即使是这么简单的条件，绝大多数的舆论却都难以做到。由于信息的真空、不对称，人们会说舆论是“愚人之论”；因为强权的压制，人们又会讲舆论是“取人之论”。虽然这些说法有过分之处，但都还是很有道理的。影响舆论形成的因素很多，使很多社会舆论难以自持，难以自洁其身，也使社会舆论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舆论的表现是多么的复杂。舆论既是观点和意见的表达，也是情绪和态度的表达。舆论表达中既有真理，同时也包含着谬误。舆论中既有直露性的表达，也有内敛性的诉求。但不管舆论怎样表现，它都是人们的思想、意愿走向意志的载体和过程。

政府对于社会舆论的影响和应对，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保密、诱导、设置象征和倡导理念四个阶段。政府的操作在很多时候要保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至少有时在监控它，于是就需要一定的诱导工作。但是，诱导工作会给政府机构带来较大的运作成本，因此，设置一些让人无法判断其利弊程度的“象征”就是比较安全和稳妥的做法。在很多情况下，“象征”就可以解决有关问题。有时候对“象征”进行保密或是对它进行抽象化的工作，还可以形成“理念”。“理念”对于政府机构的主要好处在于：人们难以对一个抽象性的东西发起冲击和责难，而且对于理念的预期性和实践性评估也不能“强人所难”，因为“理念”所体现的目标往往是渐进的、长期的目标，它是需要付出长期努力并且经常存在变数的希望，暂时的不能或暂时的挫折都应当视为正常，一届政府领导班子的存续期自然不能跟“长期”相比，这正是一些“理念”可以轻易左右社会舆论的诡秘之处。对于“理念”的发掘，往往是一些人的事，但对于“理念”的甄别社会舆论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值得注意的是，相关事项涉及的信息量与其“象征”的制造具有密切的关系。信息量是考察“象征”制造十分重要的因素。一般情况下，信息量的多少与“象征”制造的完美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这决定了许多政府和势力集团在制造“象征”时更多地采取信息封锁的政策和措施，而不是对信息的“过度”公开。例如，现代社会经济决策中，我们重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手段的配合，但在处理两者关系并且在解决具体的问题时，我们的许多决策却处于左右为难、摇摆不定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我们的近邻日本，早已形成全社会的信息收集、整合和研究机

制，这对于提高决策的精准度和决策的效率是十分有利的。信息因素不仅影响着社会的决策，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西方许多国家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历数着政府信息公开的艰难，同时也说明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现代社会的政府成为最大的社会公共信息的集散地，政府公共信息应是政府的法定义务，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毕竟公民所要面对的“象征”应当是那些符合事实、合情合理的“象征”。

二 关于舆论的思想和理论

舆论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源于人们现实的需求，它的未来走向也绝不会脱离社会的需要。社会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人类利益表达和调整的体现。人类利益的表达和体现有两个基本走向：一是人类自身现实社会条件所能提供的利益，一是人类所预测和憧憬的利益，即人类社会现实既定的利益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利益。这两方面的利益由现实社会条件和宗教、科学发展来实现。其中，政治负有控制和管理社会的使命，它在现代社会舆论表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宗教、科学舆论由于是体现人类预期和憧憬利益的舆论，社会对它的重视程度也会与日俱增，政治对宗教、科学舆论的驾驭也会不断增强。舆论引发主体的“小众化”是现代社会舆论繁荣的现实基础和突出表现。

舆论是什么？这是中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关于舆论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中西方学者对舆论的含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这里列举一些典型的例子，以供研究、参考。据刘建明先生的考证，最早出现于英语和法语的“舆论”一词的共同来源是拉丁语中的 *opinio*，是指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不确定的判断。从那之后，西方许多国家通常将它称为公共意见或公众意见^①。如今，西方英语国家对舆论比较流行的解释是依据《美利坚百科全书》舆论条：“舆论指群众对其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的综合”。16世纪初，英国圣徒沃伯支首先提出了舆论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公众”的概念。从此，公众和大众成为舆论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近代一些学者出版的关于舆论的书籍有不少冠名为“公众舆论”，如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就著有《公众舆

^① 参见刘建明《基础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论》一书，直到今天，这部著作对舆论学和新闻传播研究还有不小的影响。

古希腊时期人们对舆论就有了初步的认识，一些哲学家、思想家的观点在今天仍具有启迪和指导意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于优秀人物营造舆论的作用就作过描述，他说：“一个优秀的人，能抵得上一万个人。”这样的言论，显然是在突出社会优秀人物、社会精英的作用，赫拉克利特强调社会精英制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作用有其积极意义，却忽视了舆论价值判断在舆论表达中的重要地位，折射出时代的局限。现在我们看到，在舆论科学性判断方面和社会变革及转型时期，精英舆论有着突出的引导价值，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民意是社会舆论形成的基础，我们对于社会精英制造舆论的作用既要重视，也不能无限夸大。

古希腊诡辩家普罗塔哥拉斯谈到了国家与法的问题。他认为，所有人都应当参加政治生活，并且同等地参与政治问题的决定。这是西方学者首次提出公众议政的设想，为社会舆论影响政治打开了思想之门。以后的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对多数人的意见给予热情的肯定。他说，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人无足善术，但他们合而为一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贤良的智能。他还说，如果许多人共同议事，人人贡献一份意见与思虑，集合于一个会场的群众就好像一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耳目的异人一样，他还具有许多性格、许多聪明。……所以，把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所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些贤良所任之上是适当的，也是合乎正义的。亚里士多德看到并承认了群众智慧的价值和重要性，自然也不会低估众意对于舆论的作用。承认群众智慧，正是对舆论价值判断的尊重。

伊壁鸠鲁提出，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应相互制定契约和法律。而契约就是交换意见，取得一致的过程。这里要注意的是，自由的舆论与受干扰的舆论是不同的。那些出于公正诚实之心的表达是不应该受到干扰的。有时舆论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契约，所以舆论表达要遵循诚信的原则。同时，舆论表达也需要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约束，从整体上看，舆论表达并不具有完全的自由度。因为舆论毕竟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它要为社会服务，因此它就要遵守社会中那些应当遵守的规则。法国思想家卢梭于1762年首次提出“公众意见”的概念，他将公众意见分为公意和众意。“公意”只包括人们共同的意见，“众意”是人们相同的与不同的意见的总合。“公意”是众意的最大公约数。公意一经宣布就构成主权行为和法

律。卢梭把舆论看成国家基本三大法律之外的第四种，是国家的真正法律，是铭刻在公民内心的真正的法律。公众意见作为一种法律，监察官就是这种法律的执行者。卢梭强调的是舆论意志在更广范围内的实现。在这里应当注意，卢梭将国家看做公意的自然结果，两者具有绝对的同一性。众意属于个别人意见的众意，它是人们相同的与不同的意见的总合。公意是众意的最大公约数。众意的本性倾向于偏私，而公意的本性倾向于平等。众意着眼于个体、局部的利益，公意则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卢梭承认公意也会犯错误，但他认为总体上不会影响和损害公意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他指出，只有公意才能按照公共福祉来治理国家和社会。公意永远是稳固、不变而又纯粹的，所谓的变质，也只不过是公意转化为众意而已。他还认为如果一个政府不能认真负责地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人民就有权利更换它。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并且有义务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也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它只取决于人民大众的意愿。卢梭强调了公意的权威性，但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所谓的公意，已经超出了他所捍卫的公意。现代社会舆论的复杂性也是那时的贤人先哲们所难以预料的。他还认为在大社会里谋事应寻求和衷共济，尽量减少长期的、无谓的争论，这样公意就很容易占据社会舆论的统治地位，有利于公共利益和国民福祉的促进。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没什么可挑剔的，但在实践中，这样的想法有些理想化。卢梭还进一步指出，公共意见是一种法律，是不成文的法律，是人们内心铭刻的法律。他不断地肯定公共意见的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强调了舆论表达中的价值判断，同以往过分依赖和尊崇舆论的科学性判断相比，是一个进步。所以说，卢梭对于舆论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促成了舆论价值性判断和科学性判断的有机统一，克服了舆论判断的单一性缺陷。

黑格尔给舆论下的定义是：“个人所享有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物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这种自由，集合地表现为我们所称的公共舆论。”他描述了舆论的一些性质：它是经常存在的自相矛盾的实在，关于现象的知识，主观性的最外部表现和任意表达，以成见形态表现出来的常识，或社会的日常意识，它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所谓“意见的无机方式”，是指人民作为“分散个人的多数人”，是一种“无机的群体”，他们的行动往往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他们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

人。在他们那里，除了一些笼统的话和歪曲的演讲词外，不可能指望听到什么别的东西。黑格尔的这些观点，带有历史唯心主义色彩，反映了他思想的偏激和自傲。黑格尔认为舆论是真理与错误的混杂的产物。他说，内在的真理一旦与特殊意识、具体意见结合起来，一切偶然性的意见，它的无知和曲解，以及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也都出现了。尽管舆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黑格尔本人并不忽视舆论的威力，他认为舆论包括真正的需要和永恒的正义。他说，无论在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而舆论的评价与判断的效力，往往是权力、习惯和风尚所不及的。这些观点反映了黑格尔积极和客观的一面^①。黑格尔描述了舆论的三层内涵：一、舆论是个人享有发表自己见解的自由；二、舆论是人们意志和意见表达的无机形式；三、舆论中真理与错误混杂。

柏克认为，“对人类及其自由进行约束同样可被视为人们的权利”，国家是平衡民意尤其是民众激情的审慎的制度设计。因为民意可能被蒙蔽、误导和操纵，对于科学问题及复杂性社会问题的认识相对滞后以及不切实际的或不良的欲求等都会产生需要被控制和引导的民意。在现代社会，舆论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舆论的确立及其有效性主要由舆论质量而不是单由舆论引发主体的数量来决定。如今，舆论的过分激情和舆论的群体暴力在网络舆论中已有显著的表现，对于舆论的这种自发性错误和过失，就需要及时地纠正。

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认为，自由与政府的权力和权威是对立的。“社会自由是对于政治暴虐的防御”^②。他还指出，“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予的‘人民’并不永远是统一的。所谓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治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个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至于所谓人民的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是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这种民主政府同样可以产生暴虐，而且是一种“多数人的暴虐”。密尔认为这种“多数人的暴虐”是一种社会性的暴虐。它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更加可怕，“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

① 转引自徐向红《现代舆论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94—95页。

②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

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入，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①。抽象化的民主和信息不对称的尴尬，使拥有自恃力的舆论时常变得脆弱，舆论意志所形成的合力也容易被社会中的各种力量所化解。在许多情况下，舆论成为政治和某些群体利用的工具，这构成了政治画卷中的一幅图景。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基于对群体心理的分析，探讨了舆论表达中的“集体无意识”现象。认为人们在群体生活中，极易受“群体无意识”的支配。人们易冲动（如追星）、易变、急躁；极易受暗示（如青岛农村在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洞穴迷信”之风、80年代的“地震谣言”、“抢购风潮”；90年代的“法轮功”）；情绪表达简单、夸张（如痞子风气、盲目崇拜等）。群体心理感性、易变，并出现干预政治的趋向。弗洛伊德不认为“群体无意识”现象的形成是因为群体生活中有一种特殊的、难以理解的力量。而是来源于性和爱的本能。人类具有信仰，地球上最强大的制约力量之一是名誉感和舆论，如西方“宣誓”对人们的约束就很强。李普曼也肯定了信仰、信念对于舆论形成的作用。他认为，舆论的形成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利益，更大程度上为公众自身的信念所左右，所以，新闻宣传的力量不可低估。

我们应当看到，“集体无意识”的实质恰恰是集体有意识，它是一种有意回避的意志行为。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集体失语”现象就是比较典型的表现。而这种“集体失语”经常会对社会公正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侵害。如近年来发生在湖北省京山县轰动全国的“余祥林杀妻案”，在这个案例中，新闻媒体的“集体失语”令人担忧。1994年4月，湖北省京山县农民余祥林被当地人民法院以故意杀妻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5年3月28日，其妻张在玉突然出现，至此，余祥林的冤案才昭然于世。造成这起冤案的原因是什么呢？据有关媒体的报道，造成这起冤案的主要原因是司法人员滥用司法程序，甚至采取刑讯逼供手段获取证据。然而，我们进一步追问，造成司法人员违法行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里主要还是一个监督缺失的问题，其中媒体监督的缺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说，自余祥林入狱11年来，其母、其兄没少为其申诉辩白，几乎所有的单位都已跑尽，但所有努力都归于徒劳，尤其是媒体在此期间也

①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页。